

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

人 民 出 版 社

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

共运室

人 民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批判斯大林問題文集

*

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公厘 $\frac{1}{32}$ ·印張 8·字數192,000

1956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00 定價(5) 0.65元

統一書號 3001·479

出版者說明

這本書，收集了今年6月以來各國共產主義政黨的中央委員會和領導人所發表的關於批判斯大林問題的決議、聲明、論文、報告以及黨的機關報的若干社論。這些文件，是按照發表時間的先后編排的。

人民出版社

1956年7月12日

目 錄

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答記者問：	
社会主义民主的問題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發展……………	1
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總書記丹尼斯：	
美國和赫魯曉夫的特別報告……………	29
法國共產黨政治局聲明……………	41
挪威“自由報”：	
关于陶里亞蒂談話的評論……………	43
瑞典“新日報”社論：	
关于陶里亞蒂的辯論……………	45
英國共產黨政治委員會聲明……………	48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	52
美國共產黨关于苏联批評斯大林的聲明……………	54
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在意大利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上的報告……………	57
比利时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	104
奧地利“奧地利人民之聲報”社論：	
在我們黨內的討論經過……………	106
荷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會議公報……………	108
荷蘭共產黨總書記格魯特在荷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會議上的講話……………	111
挪威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李皮：	
关于赫魯曉夫報告的討論……………	125
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總書記艾地：	
在雅加達群眾大會上的發言（关于反对个人崇拜	
問題部分）……………	130

意大利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決議(摘錄).....	133
芬蘭共產党总書記培西答記者問:	
芬蘭共產党对个人崇拜和集体領導的問題所持的 态度.....	136
美國共產党全國委員會主席福斯特: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140
德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書記处:	
对公开問題的答复.....	145
加拿大劳工進步党执行委員會声明.....	155
* * *	
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 的決議.....	159
* * *	
意大利共產党总書記陶里亞蒂:	
敌人的存在.....	178
意大利共產党总書記陶里亞蒂:	
关于苏联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声明.....	181
美國共產党全國委員會总書記丹尼斯:	
評苏联共產党的決議.....	182
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社論:	
意义重大的文件.....	183
匈牙利“自由人民报”社論:	
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文件.....	187
美國共產党全國委員會主席福斯特:	
成就和錯誤.....	190
法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声明.....	193
羅馬尼亞“火花报”社論:	
在列寧主义原則性的旗帜下.....	196

保加利亞“工人事業報”社論：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走向新的勝利·····	203
蘇聯“真理報”社論：	
共產黨是蘇聯人民的鼓舞者和領導者·····	210
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聲明·····	221
越南“人民報”社論：	
歡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 其後果的決議·····	234
波蘭“人民論壇報”社論：	
極端重要的文件·····	237
印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議·····	242

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答記者問：

社会主义民主的問題和 社会主义民主的發展

（原載1956年6月17日意大利“團結報”，

小標題都是“團結報”編者加的）

蘇維埃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對社会主义法制的嚴重破壞是怎樣能產生的——探究原因以及防止重犯斯大林所犯錯誤的保證——糾正錯誤將給予社会主义社会以新的推動力量——當前局勢下蘇聯同國際工人運動的關係

“新議論”雜誌就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問題向政界和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提出了九個問題。下面是陶里亞蒂同志對“新議論”所提問題的答復：

- 一 在你看來，蘇聯對個人崇拜的譴責意味着什麼？
內政上的動機是什麼？外交、政治、社會、經濟、
心理、歷史方面的動機是什麼？

蘇聯共產黨人對個人崇拜的譴責和對斯大林工作的批評，在我看來，不意味着其他，只意味着蘇聯共產黨領袖們所說過的以及人們不斷重述的一切，不多也不少。必須提防兩種錯誤的解釋。第一，即使不說是最可笑的，至少也是最粗魯的解釋，就是，認為或者假裝認為：蘇聯共產黨人由於宣布這種譴責和這些批評，因而就轉到——假如不說是反共的立場，至少也是從來就

既不贊同也不理解共產黨人行動的那些人的立場上去了。我的意思是說：據說他們已經把他們的一切原則立場以及實際立場，整個的過去，他們以往在那麼多年的行動中所肯定、支持、維護、實現的一切都扔到海里去了，或者說，準備扔到海里去。反共旗手們會這樣來解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們今天應當比過去重視他們。何況這些人由於趨於極端就暴露出了自己的計謀，而且証明了自己懷有惡意。但是我要公開說：我並不排除有一些人可能充分出於善意而落到採取這樣的立場以至開始懷疑：考慮到對斯大林提出的批評，考慮到在整整一個時期斯大林曾經是共產主義政策的主要代表，今天是不是有理由來懷疑這個政策的所有主要時期的正確性，例如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時期反對帝國主義陰謀的堅決態度開始，經歷雅爾塔和德黑蘭而追溯到1939年同德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以至於追溯到西班牙戰爭，等等；在另一方面，追溯到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示和對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人們的鬥爭，而且反正我們這樣追溯既往——為什麼又不追溯到十月革命中決定性行動本身，即工農兵蘇維埃的奪得政權、制憲議會的解散和社會的新政治結構的建立。對充分出於善意而似乎這樣來解釋事物的那些人，我們應當說他們錯了。自然，對於蘇聯共產黨人用來奪得政權和奠定他們的現有社會秩序的一切行動，是始終可以進行討論的，而且人們無疑還將長期就此進行討論，以便明確其性質、內容和後果，以便從歷史觀點尽可能準確地加以估計。蘇聯同志們今天正在從他們的歷史中把為了過分頌揚斯大林個人而寫進去的那些錯誤和誇大詞句刪除，這樣將可以作出越來越準確的歷史評價。這並不排除這種可能（甚至很容易預見到）：很多評價將被修正，對於一定時期中行動上的某些缺點、錯誤和消極方面的批評將明確起來。但是如果認為：把一切人和事件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的這種特殊修正，是蘇聯共產黨人方面對他們半個多世紀以來發

展起來的行動的根本否定或根本的毀滅性批判，那將是嚴重的錯誤。上述行動經歷了人所共知的一切連續階段的發展過程，仍然是工人階級取得社會領導權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影響重大的革命活動的第一個偉大歷史範例。

第二種錯誤是把對斯大林的批評和對他個人的崇拜的揭露看成是在共產黨和蘇聯國家領導人中間發生的一種個人之間或者集團之間的鬥爭的片段，好像在實質上只是为了爭奪權力的一種鬥爭。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報刊特別熱中于把蘇聯發生的一切都作這樣的解釋。它為了搞這一套而擁有它的專家，這些專家在某某部或某某組織的負責人被更換的時候，能夠準確地估計某某領導人失掉了多少公分政治勢力，某一批人又向獨享的權力前進了多少公尺等等。當這些微妙的猜測性估計用來談論文職人員和軍人之間、技術人員和黨的人員之間的鬥爭和對立的時候，我們就聽到了無與倫比的謬論。

情況是：在蘇聯，技術人員和黨的人員往往就是同一個人。至於軍人，大家知道，自從革命以來所進行的一切黨內鬥爭中，從來就沒有過軍隊作為軍隊表明態度的事。因此，這種事情還是讓愛好政治花絮和流言的人去操心吧。我們不能、也不願排除這種可能：在蘇聯領袖們制定最近的政治決定和判斷的過程中，在他們之間或許出現過辯論中的衝突，甚至出現過激烈的爭論。一個生氣勃勃的、內部活動沒有由於對一個人的崇拜而窒息的有機體，正應該這樣行動。但是，沒有任何事實、跡象能夠以任何方式証實以批評斯大林和批評對他個人的崇拜為掩護而暗中進行爭奪權力的鬥爭這種說法。即使在這方面，我們還是可以進一步探討。要了解斯大林逝世以後情況是多麼困難，只要知道——那怕是膚淺地知道——斯大林不僅在黨的幹部和黨員心目中、而且在廣大人民羣眾心目中所以佔據的地位就夠了，只要理解糾正他所犯的錯誤、揭發這些錯誤、在許多方面走上新道路這一任務是多麼艱巨而障礙重重就夠了。這種顯而

易見的困難說明公開揭發以往所犯的錯誤為什麼不能在斯大林逝世以後立刻就做。那樣做，不僅不會被理解，而且還有可能引起消極的、危險的、不可控制的反作用。相反，立即開始的顯然是：首先在領導方法方面，然後在其他各方面，從事實上糾正這些錯誤。而且，顯然，要是在領導集團內部發生了個人或集團之間暗中爭奪權力的鬥爭，那就不能完成這種糾正。要對在斯大林領導下所犯最嚴重錯誤的血腥後果負主要責任的人之一的貝利亞被清除，這件事情本身就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這次清除是在既沒有引起領導集團內部的動搖，也沒有引起公共行政各部門之間的衝突的情況下迅速進行的。

因此，為了在這一點上作出結論，應該習慣於這種想法：對蘇聯同志們來說，對斯大林和對崇拜他個人提出的批評的意義，正是他們到目前為止一直在說的。那末，他們究竟說了些什麼呢？他們說：由於斯大林的錯誤和對他個人崇拜的結果，積累起一些消極因素，形成了不利的局勢，甚至在蘇維埃社會各部門中，在黨和國家各部分的活動中形成了顯然惡劣的局面。但是，要用一個總的名目把所有這些消極的方面概括起來並不是簡單的事。因為，這樣做有產生過份的、武斷的和虛假的概括的危險，也就是有認為蘇聯的整個經濟、社會和文化現實不好而加以否定、批判的危險，這就會同歷來的反動無稽之談不謀而合。比較不武斷的概括是：從斯大林的錯誤中看出，由於個人權力逐漸凌駕於在根源上和性質上都是民主的集體機構之上，官僚主義、法制的破壞、停滯狀態和社會有機體各種崗位上的部分退化等現象就積累起來了。但是，應該馬上補充說一句：這種凌駕一切之上的情況只是部分的，它的最嚴重的表現大概是在國家和黨的最高領導機構方面。隨着就產生了這樣的一種傾向：限制民主生活，許多方面（技術和經濟、文化活動、文學、藝術等）抑制思想和行動的主動和活躍。但是人們絕對不能從此得出結論說：這就摧毀了民主和社會主義性質所由產生的，使蘇維埃社會在

本質上比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優越的蘇維埃社會的基本性質。蘇維埃社會不可能對這樣的錯誤感到滿意，而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政權恰恰相反，即使在更嚴重的錯誤和形勢中也是感到滿足的。這些錯誤不可能成為當時公民生活、經濟和政治生活中普遍的持久的因素。這些錯誤如果長久繼續下去，它們也許就會造成決裂，儘管這樣的假設是應該慎重地提出的，因為決裂對於人民群眾和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必定是利少害多的。這樣的事情，不僅那些本來也許想造成決裂的人，而且相當廣泛的社會階層都是認識到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斯大林所犯錯誤的後果不是十分嚴重的。這些錯誤是極為嚴重的，它們擴及很多領域，而且我不認為糾正它們是容易的，我也不認為能夠迅速地糾正這些錯誤。實質上，可以說蘇聯社會的領導幹部中一大部分（黨、國家機關、經濟、文化等領導幹部）在對斯大林的崇拜之下變得麻木了，他們在思想中和行動中的批評和創造能力失掉了或者減少了，因此，要宣布對於斯大林錯誤的批判，就絕對必需採用可以震動人心、並且使複雜的社會主義制度所賴以建立的各种機構重新充滿活力的方式。這樣才可能使這個社會獲得新的民主進展，而這對於各國人民之間更好的了解、對於緩和國際局勢、對於社會主義和平的進展將是有力的貢獻。

二 你相信在蘇聯所進行的反對個人崇拜的批評應當引起一些制度上的變化么？

三 政權的合法性是公法的重大問題，現代政治思想傾向於把人民意志看作合法性的基礎。西方式的議會民主主張：要有不止一個政黨，人民意志才能表達出來。你是否認為這一點是正當的：一黨制度的政權，而且在選舉中無從在政府和反對派中加以選擇。

也許我的看法不对，不过我認為：今天不能够預料苏联会有制度上的改变，不能够預料这种改变会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的批評中產生。这并不是說，相当重要的改变就不能实现，何况，某些改变已經开始了。

首先，制度上的改变是指什么來說呢？我認為：采取这种說法的人指的是政治機構的改变，就是說，使苏維埃社会退回去接受所謂“西方”制度所特有的至少某些形式，再不然，就是使这些制度所特有的某些組織機構具有新的重要性。假如是这样提出問題，我的答复是否定的。

假如人們当真想研究研究政权的合法性和它的根源，我們就来談談吧，不过讓我們努力擺脫在处理这个問題的时候“西方文明”的辯护者所不肯放弃的虛伪形式主义。我們讀过“國家与革命”，我們沒有忘記它所教導的对我們極其有益的内容。对斯大林錯誤的批評不会使我們忘記它。实际上，在这种“西方文明”中，政权合法性的根源根本不是人民意志，充其量，人民意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媒介来对决定一部分政府方針起作用。但是，在选举中（意大利的例子就証明这一点）人們采取了層出不窮的压力、恫嚇、煽动、作弊、合法与非法的干預，結果形成相当嚴重的限制和对人民意志的歪曲。这种手段不僅为当时恰巧掌握着政府的人的利益服务，而且为社会中由于财富、占有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以及由此而来的其他等等而掌握着实权的人的利益服务，他們的实权开始于对政治生活的事实上的領導，接着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宗教当局和其他一切权势機構就必定会給他們的实权以保护。

我們肯定地認為：今天，鑒于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發展和运动的現有力量，有可能把这种防止自由表达人民意志的制度打开相当寬闊的缺口，有可能为表达这种願望而开辟日益寬闊的道路。因此，我們的行动依据民主范圍，而且不超越民主范圍；我們認為日益前進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們無視

现实，也不意味着必須把西方世界中民主發展的方式当作偶像，当作絕對和普遍的范例（只需要在这个西方世界里深入一步看看，就可以看到西班牙、土耳其、南美洲和葡萄牙的例子，更不用提美國通行的歧視性选举制度等等事情了）。因此，我們繼續認為西方式的民主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在很多方面是虛假的民主，必須通过种种經濟、政治改革來予以發展和改善。因此，即使我們承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了苏維埃民主發展的新進程，我們也远不能想像：这种發展会以回復到“西方”形式的制度來表現，我們坚决認為这样想是錯誤的。

为了糾正所犯的錯誤而必須進行的修改

苏联政权合法性的根源首先是革命。革命使工人階級取得了政权，工人階級当时还是少数，但是它在解决当时所提出的民族和社会各項重大問題中却能够同所有的人民群众逐漸結合起來，改变國家經濟結構，遵照社会主义的原則來創造一个新社会，并且使它运行而向前發展。忘掉革命，不考慮新的社会結構，忘掉苏联所具有的一切特征，然后把它去同資本主义各國政治生活方式作表面的比較，这完全是欺人的行为，僅此而已。

但是这样粗淺地回顧一下实际情况还是不够的。苏維埃社会一开始就有它特有的政治結構，这种政治結構正是建筑在苏維埃（工、農、兵委员会）的存在和运行上的。苏維埃制度比任何傳統的各式民主制度都民主得多，也先進得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制度使民主生活通过劳动人民的基層組織，逐級地通过城市和州的議會，而后通过全國性議會，深入到構成社会的一切部分。第二，有了这个制度，生產單位和民主生活的基層小組就能密切結合，这同傳統民主組織的消極方面——生產和政治脫節，从而自由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比較起來，就优越得多了。苏維埃制度运行中是否可能發生停滯和受到障碍？苏維埃民主制是否会因而受到限制呢？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第

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經公开承認的事實。由于專斷的官僚主义領導方法和对政权法制的破坏，苏联民主生活就受到了限制，部分地受到窒息。从理論上說，这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必然就可以避免錯誤和危險。硬說能够避免的人只是証明其幼稚。社会主义社会不僅是由人組成的，而且它还是一个正在發展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内部不断表现出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这个社会也随历史演变而演变。事实上，应该研究一下苏联民主生活的这种限制为什么和怎样能出現的，但是，不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何，我們毫不怀疑这样一点：不可能得出必須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組織形式的結論。

多党制或者一党制本身不能被認為是区分資產階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同样，它也不構成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之間的分界綫。在苏联，革命以后，在苏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有个时期曾經是由兩党执政的。在今天的中國，几个政党共同执政，而政权并不因而就不是民主專政。在某些人民民主國家中，也有同共產党不同的各种政党，虽然并不是所有人民民主國家都是这样。在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非常强大而且先進的、今天仍然是資本主义的各國，不能排除在多党存在的情况下由于其中某些政党的主动而發生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在今天的苏联，不可能設想多党制度的存在。那么，多党制从何產生呢？

由上面作決定嗎？應該說这样做是一种奇怪的民主程序！應該承認，苏联社会是由于消滅了資本家階級而造成社会成分一致的社会，不僅存在着体现为工農联盟的政治一致，而且在那个國家里还存在着“西方”世界的人們所不知道的、也許更不了解的公民生活和政治領導的統一。在苏联，甚至党这个概念本身也同我們的概念不同。党为实现和發展社会主义而工作、斗争，但是，它的工作主要是積極的和建設的性質，而不是以假定的内部反对派为目标的紛爭性質。党对之進行斗争的“反对派”，是

應該加以克服的客觀障礙，是應該在工作中加以解決的矛盾，是應該加以控制的現實，是為了使新東西向前發展而應該予以消滅的舊東西的殘余，等等。對於社會發展具有根本意義的對立物的辯證發展，已經不再體現為不同的政府黨派或反對黨派之間的競爭，因為，那個國家里沒有進行這種競爭的客觀的（即在事物中的）根據和主觀的（即在人們思想中的）根據。這種辯證發展體現在包括彼此配合的一系列組織（黨、蘇維埃、工會等等）的單一體制內部。對斯大林的批評，就是批評他阻止了體制內部的這種表現。糾正就表現為恢復這種正常性質，而不是表現為否定制度，或者推翻制度。但是，雖然我認為為了后退就要破壞制度這種假設是荒謬的，但是我仍然深信：依據最近取得的經驗，依據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依據必須具備防止像斯大林所犯那樣的錯誤的更有效的保證的必要性，有可能和必要來進行甚至是深刻的修改。必須把注意力集中於這一點，必須密切注視和研究蘇聯的黨和政府正在逐漸採取的各種新措施。在今天，最令人感興趣的、最有廣泛意義的措施，就是使經濟領導越來越顯著地傾向於地方分權的措施。當初必須迅速實行極其深刻的改變，鏟除資本主義基礎和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同時又必須面對經濟、政治、軍事的迫切需要，在這樣的時期，最高度的中央集權曾經是必要的。對於社會主義經濟領導說來，中央集權本身——特別是這種極端的中央集權並不是非採取不可的一種形式。是否應採取或多或少的高度集中，從而從上面實行領導，是由於複雜的客觀情況所迫，但是，高度集中的程度是同地方民主生活發展的程度、群眾活動和創造精神發揮的程度成反比例的；在我們看來，群眾的活動，他們事實上的參加批評和監督，從而參加任何經濟和社會機構的領導，是民主的真正表現。在我們這裡，在多黨制度之下，在政府和反對派辯證的相互關係等等制度之下，這種群眾活動卻沒有以任何形式、以任何方式表現出來，甚至沒有以十分有限的和間接的形式和方式

表現出來。因此，我們有理由說：這種制度不是真正民主的制度，我們不能理解：為了糾正斯大林的錯誤，蘇聯人民為什麼就必須后退。

我還要談談關於防止重犯斯大林所犯的那些錯誤的有效保證。我知道：關於這一點，有人提出“司法獨立”（即分權）的主張，以為這是可以防止任何破壞法制行為的可靠靈藥。老實說，我是不相信這種靈藥的。法官應當享有獨立地位，蘇聯憲法，正如其他許多憲法一樣，已經保證了這一點。而對這種準則的違犯只是發生在事實上的，不是發生在法律上的。何況，法官不是、也不可能是生活在社會之外、在社會矛盾、社會上主導和優勢潮流之外的公民。一個英勇的游擊隊隊長，假如在戰爭環境下有人指責他消滅了一個被指控為間諜的人，在十年以前，任何法官是不會想到把他判處徒刑的——我說的是徒刑。而今天，人們就這樣做了。法官是“獨立的”麼？也許，從形式上看，是不直接接受各屆政府的命令約束的，但是，法官們並不是不受加斯貝利之流十年來為了詆毀游擊運動、控告游擊隊和判處游擊隊的領袖們而進行的宣傳的影響的。法官們是統治階級的構成部分，這個階級內部產生的無論正確與否的思想潮流，他們是逃避不開的。現在，據說蘇聯在斯大林時代有過一些審訊，宣布過不合法的、不正確的判罪。宣布這些罪刑的法官們十分可能並不是出賣了良心的公民。

他們是這樣的公民：他們相信，斯大林所主張的、當時在全國人民中間傳播的關於必須予以消滅的“人民公敵”到處存在的這種錯誤的學說，是有根據的。因此他們雖然形式上是“獨立”的，他們卻仍然以這種方式進行審判。黨和政府政治領導路線的正確，才是真正的保證，而要使路線正確就只有在公眾生活的各个方面永久而密切地聯繫人民群眾，從而加強黨和國家內部的民主生活。法官同人民的接觸越密切，他越公正。